

廊师研究文库·历史卷（第一辑）



明史续探

南炳文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廊师研究文库·历史卷（第一辑）
总主编李士杰 本卷主编王越旺、陈新海



明史续探

南炳文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明史续探 / 南炳文著.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8.6

(廊师研究文库 / 李士杰总主编. 历史卷. 第一辑
)

ISBN 978-7-5528-0694-6

I. ①明… II. ①南…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明代
IV. ①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5493号

明史续探

南炳文/著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冠宏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 字数 195 千字

2018 年 7 月 第 1 版 2018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694-6 定价: 45.00元



总 序

李士杰

筹划已久的“廊师研究文库”终于要面世了。看到这些展示我校科研学术水平的成果得以出版,心中感到由衷的高兴,遂欣然作序,置之卷首,以飨读者。

廊坊师范学院成立于1946年,前身是安次县立简易师范学校,2000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省属本科院校。学校坚持以学科专业建设为龙头,努力打造以教师教育学科专业为主体,理、工、经、管、法等多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格局。现开设本、专科专业90个,涵盖九大学科门类。学校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推进教学改革,积极探索推进应用本科转型等各项工作,努力向着建设特色鲜明的师范大学的目标迈进。

2016年7月,为提升我校科研水平、整合学校文科研究资源、引导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我校引进了南炳文、乔治忠、万明三位来自南开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知名专家,并与中华书局合作成立了“明史与明代文献研究中心”。学校将历史、文学、教育、政治等文科专业的主要师资力量都纳入研究中心的队伍中,整合出明代史学史、明代官私史籍整理与研究、明代北直隶教育研究、明清廊坊地方史研究

等十个研究方向。中心主任南炳文教授为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廊师研究文库”的想法也是南教授最先提出的。

学校对“廊师研究文库”的出版规划非常重视,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根据规划,本文库拟分历史、文学、教育、经管等卷,每卷以10种为一辑。文库所收录成果将突出学术性,强调研究深度,严守学术规范,注重学术创新。学校专门设立评审委员会,对入选论著进行审核,具体的编辑工作则交给固定的出版社负责。

我们将积极吸纳全校优秀学术成果,力争将文库做成学术性强、研究水平高、意义重大的学术创新工程,作为向外展示我校学术水平的窗口,不断做下去。

自序

这本文集是我自1996年出版第一本文集后的第五本自选论文集,所收文章皆属2007年以后撰写而未收入本人业已出版之文集者,凡二十四篇。此文集之得以出版,得益于廊坊师范学院及其所属社会发展学院的支持。2007年以来,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主持“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校勘记修订工作,因而此文集中的前六篇皆与这项工作有关,或直接谈及《明史》校勘工作,或系伴随这一校勘工作的进行而对必须使用的某些历史文献的研究所得;而后的第二组九篇,主要是关于明代整体或个别明代具体人物等的研究成果;最后九篇主要是为自己和学术界朋友出版的著作之类所写的序言等。由于此文集的绝大部分内容与明代历史或有关文献有关,因而命名为《明史续探》,以与我的第二本文集《明史新探》之书名相关联。我自2016年7月,承蒙廊坊师范学院及其所属社会发展学院诸位领导的好意,在继续承担南开大学的有关科研、教学任务的同时,以特聘教授的身份兼作廊坊师范学院的若干教学和科研工作,这是本文集得以荣幸地编入“廊师文库”之中的原因。在本文集交付出版之际,除对廊坊师范学院及其所属的社会发展学院诸位领导(恕我不能一一点名)表示衷心感谢之外,同样向迄今一直大力支持、帮助我的科研、教学工作的南开大学及其所属历史学院诸位领导(同样恕我不能一一点名)表示衷心感谢。还要衷心感谢天津古籍出版社赵娜等在出版过程中提供的帮助,衷心感谢廊坊师范学院为我安排的学术助理王雅洁女士打印、校对文字的辛劳。本人一直一心扑在科研、教学上,全部家务推给家人,尤其是推给夫人刘金荣,兹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慰问和歉意。父母及前妻吴彦玲虽已不在人间,而肯定仍在天上挂念着我,兹将此文集恭敬相献,并祝他们在天堂平安。

2017年10月30日写于廊坊师范学院

目 录

上编 《明史》校勘

《明史》校勘修订和信息时代的到来 / 3

论明史、明史研究及点校本《明史》修订 / 11

张廷玉《明史》重要拟稿徐氏《明史》试探之一

——序言作者韩方卓乃沈朝初之号说 / 25

张廷玉《明史》重要拟稿徐氏《明史》试探之二

——论徐氏《明史》之流传、内容、特点与影响 / 35

“迈注”之“迈”何许人也

——复旦本《明史列传稿》研究之一 / 56

附：十年辛苦不寻常

——就点校本《明史》修订初稿完成访南炳文先生 / 65

中编 明史研究

过去、当代、未来三个角度看明朝

——喜悦、自豪及遗憾 / 79

明清时期古代中国社会的终结及其教训 / 88

关于中国古代民众群体暴动事件的几点浅见

——在日本京都中国古代民众群体暴动事件学术讨论会上的
发言提纲 / 95

海瑞的改革生涯及其当代价值

——纪念海瑞诞辰500周年 / 99

关爱乡梓的海刚峰 / 120

王竑救灾活动与传统政治思想的优秀成分 / 144

论袁黄及其研究的当代价值 / 154

沈周首次游南京十一岁、十五岁两说皆误辨 / 162

明中期葡萄牙人入居澳门时间补考

——试解《明史》《明熹宗实录》误载之缘由 / 174

下编 序言及其他

《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自序 / 181

《“盛世”下的潜藏危机》绪论 / 183

眼光深远、结论可靠的学术巨著

——万明《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序 / 187

《历史文化遗产——广宗政协文史资料专集7》序 / 189

张著《明代海南文化研究》序 / 192

詹长智等编《海南全书》序 / 193

眼含感激泪,深情忆故乡

——忆广宗古城及母校广宗中学 / 196

三修西兆通宝塔记 / 206

最难忘的敬仰与感激

——忆明清史专家关文发先生 / 208

上
編

《明史》
校勘

《明史》校勘修订和信息时代的到来

笔者和《明史》界的十几位朋友,自2007年以来一起进行了点校本《明史》校勘记的修订工作。这项工作基本遵循了20世纪50至70年代先师郑天挺先生领导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诸位先生点校《明史》时规定的校勘诸原则和具体办法,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原有校勘记进行了复核、修订。

郑先生等在点校《明史》时所规定的诸原则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把重点放在“校史”上,即主要工作为利用本校和他校的办法,将《明史》中的史实失误(包括时间、地点、人名、史事等内容之失误),寻找出来,加以改正或指出。至于利用万斯同《明史》、王鸿绪《明史稿》等《明史》拟稿作比较,以改正《明史》的文字失误,即进行“校文”,只是修订工作中的很小部分,且即使这部分工作中,除“校文”外,“校史”的成分也很大。这与“二十四史”中的其他各史多数以“校文”为主有所不同。《明史》之所以在校勘中主要做“校史”的工作,乃是因为其书之祖本即殿本尚存于世,其他各本皆是依殿本而翻版,在发现因版本不同而造成文字不同时,只能以殿本为正,不需作什么考证、推敲,换言之,《明史》不需作本书的版本校,在文字上以殿本为准即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明史》中在史实方面存有若干失误,而与明代历朝相关的文献存在甚多,爬梳与明代历史相关的文献,可以发现《明史》存在的史实失误,于是为了使《明史》记事更为准确,提高其价值,就应该在注意校勘文字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利用与明代历史相关的文献存在甚多的条件,对《明史》从事以“校史”为内容的校勘工作。至于“二十四史”的其他各史,一因其本身存在许多版本,无所谓祖本以定于一,二因他校的资料数量有限,难以据之将其记载的大部分内容考辨出真相,少部分可加考辨者亦往往以所据资料不充分难于得出定论,故而多数史书只好从事以“校文”为主的校勘工作。由此可知,郑先生等在点校《明史》时所规定的原则,是正确的,符

合实际的,也是可行而行之有效的。有鉴于此,笔者等在这次修订中,完全依从了郑先生等所规定的原则。

在“校史”为主原则的指导下,笔者等的具体修订程序如下。在初稿起草者起草阶段,首先是找出应予校勘的失误或疑点,其办法有六:一、比校本书上下文之相关记载;二、比校万斯同《明史》等拟稿;三、查阅《明史》及其拟稿外的其他相关文献如《明实录》的相关部分;四、查阅点校本《明史》之原有校勘记的相关部分;五、查阅前贤时彦在报刊刊出的相关研究成果;六、查阅起草者本人的原有相关读书记录。其次是根据上述六个办法寻找失误或疑点得到的印象,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思考,以得出结论。再次是作出校勘记长编,内容包括摘引有关原始文献记载,按照逻辑加以排列,并作出简要论述,提出明确的正误判断,或作出存疑之决定。最后是简化校勘记长编的文字,写出简明扼要的校勘记,其内容主要包括正误判断和资料根据。初稿起草者撰写的初稿完成后,修订工作便进入了笔者修改、加工的阶段。在此阶段,首先是对初稿校勘记长编和初稿校勘记进行全面复核,这一复核实是将前一阶段起草者所进行的各项工作重来一遍,而后结合阅读笔者所积累的有关读书记录,及补读笔者认为尚需补读的前贤时彦研究成果和有关文献等,对初稿的结论加以评判,进而对初稿校勘记长编及初稿校勘记,或予肯定认可,或予补充发挥,或予修改完善,或予否定取消,或推翻重写。若发现除所复核校勘记长编和校勘记外,尚需对此校勘对象所在《明史》中的上下文补作其他校勘记长编和校勘记者,即予补作,以尽量避免遗漏。

迄今为止,大部分初稿起草者已完成了所承担的起草任务,上交了修订版的相关校勘记长编和校勘记的初稿,这些初稿的大部分笔者也已初步改完。将已经初步改完的部分与点校本《明史》相应部分原有校勘记相比,主要是校勘记条数有较多的增加。如本纪部分共24卷,原有校勘记118条,新定821条;地理、礼、乐、刑四志共27卷,原有校勘记204条,新定1907条;宰辅年表2卷,原有校勘记9条,新定103条;前期人物传记91卷,原有校勘记397条,新定1767条。以上所举本纪、志、表、列传,凡144卷,原有校勘记728条,新定4598条,新定者是原有校勘记的6.3倍强,净增5.3倍强。限于时间,

其他卷改定的校勘记条数尚未来得及加以统计,而估计其增加校勘记的数量情形,当与上述作过统计的部分大体相当。这次《明史》点校的修订工作是否成功,尚有待最终完成后学界的检验。但笔者个人感觉,由于增补了数量较多的新校记,这次修订工作似可称为有一定的成绩,使《明史》的校勘在郑天挺先生等前辈原有成就的基础上有所进展。论功力和水平,笔者等难与郑先生等前辈相提并论,不得望其项背。笔者等何以能取得上述进展呢?其主要原因当在于吾等生逢其时。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郑先生等校勘《明史》时,所使用的文献资料基本上限于南开大学图书馆和天津市图书馆两馆的藏书。此两个图书馆虽然也算国内有名的较大图书馆,但馆藏文献数量毕竟有限,遇到天津未藏而必须查阅的文献,只能购火车票,搭乘每天只有数趟的火车,前往北京设法寻找,不算两头而只计乘火车的时间,即须花两三个小时,为解决一两字的问题,从头到尾,最为顺利也要花上两三天。另外更有出差经费极端缺乏的客观不便,非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到北京出差。这使《明史》的许多失误因此而留存,没能被校勘者发现。此外,其时没有数据库之类新鲜手段,校勘者只能依靠自己的经验,选择可能用得上的一本本文献,用手工翻检,大海捞针似地寻找有用资料,以便发现疑点、作出比较和判断。其效率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也使《明史》的许多失误无法被发现。然而到了笔者等修订《明史》校勘的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作条件大大不同。电子图书的问世、多种数据库的出现,使笔者等不出家门,即可几乎能用上全国以至全世界的所有图书馆的文献,想好主题词,手指一点,即可将有关资料几乎全部集中起来,依次接受检阅,任笔者等对比、选择、分析、判断,从而迅速发现和解决《明史》中的相关失误。这样的条件,是笔者等的先辈郑先生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不得享用的,笔者等由此而在修订中比郑先生等发现和解决更多的《明史》失误,实非不可理解之事。放下电子图书和数据库的条件不谈,从纸质图书在近三十年的大量出版来看,笔者等在郑先生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写出较多数量的新校勘记,也是可以理解的。近三十年,我国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各种事业空前发展,出版业非常发达,大量古籍被印刷出来。在被印刷出来的大量古籍中属于明代文献者更占大头。我国

印刷图籍虽正式出现在隋唐时代,而真正发达、普及起来,乃在明朝中期。因而现存的古籍属于明朝者所占比例甚大,属于清朝者所占比例也甚大,存世的明清两朝古籍合起来占我国现存古籍的绝大部分。由此在近三十年大量被印刷出来的古籍中,属于明朝的占了很大比例。如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出版的综合性大型丛书有《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序刊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正补编(齐鲁书社1995年至1997年出版)、《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其中《续修四库全书》共收书5000余种,其中属于明代撰写者为1133种,占总数的1/5以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正编共收书4511种,其中属于明代撰写者2667种,约占总数的3/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共收书219种,其中属于明代撰写者为109种,约占总数的1/2;《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共收书近2000种,其中属于明代撰写者为235种,约占总数的3/25;《四库禁毁书丛刊》共收书600余种,其中明人撰写者397种,约占总数的3/5强。再如,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出版的规模稍小一点的综合性丛书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商务印书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出版)、《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一辑和第二辑(西南师大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8年至2011年出版)、《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其中明人撰写者所占比例也很大,如《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中,地理类收书49种,其中明人撰写者为27种,占总数的1/2强,别集类收书153种,其中明人撰写者为75种,约占总数的1/2。又如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出版的地方志丛书有《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重印本)、《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出版)、《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1992年出版)、《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序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等1990年序刊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出版)、《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出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出版)。这些丛书,除专收明代方志者外,其余丛书所收方志也以明代撰写者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撰写方志最多的两

个朝代,此决定了明代撰写的方志必然成为这些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种种丛书,不仅使数量庞大的明人所撰书籍大量印刷出来,公布于众,而且变分散为集中,变稀见为通行,为修订《明史》校勘时之利用,提供了极大方便。此外再加上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还出版了《中国明代档案总汇》等许多资料汇编和种种明人文集等单行明代文献,也为修订《明史》校勘时之利用,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笔者等在这次修订《明史》校勘中所写校勘记比原有校勘记有所增加,实为情理中之事。总之,笔者等取得如上进展,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信息时代的应有产物。信息时代使笔者等在修订《明史》校勘中如同得到了望远镜、显微镜,从而可以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明史》中的一些记载失误。

回忆几年来修订《明史》校勘的实践,笔者有几点感受深深地印在脑海中。一是没想到平素奉为经典的《明史》和《明实录》竟然错误甚多。已有的《明史》点校本,已经纠正了《明史》中相当数量的失误,这次修订却又新发现多几倍的失误(这些新发现难免有的属于误判,但似大部分并非误判),而且这次修订也肯定没能把所有失误全予发现,漏网之鱼必然仍旧存在。《明史》虽不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原始史料,但肯定是学习和了解明代历史的不可不读的最系统、最易读的重要史籍,其存在史实记载的大量失误,显然是不应坐视不管的。笔者在以前接触《明实录》时,已经了解到《明实录》不仅有黄彰健先生等所作校勘记中指出的大量文字失误,而且在史事记载失误方面也常有发生。而这次修订《明史》校勘中,由于《明实录》是最基本的比较史籍,对其接触更为频繁,因而加深了对其了解。一方面对其记载的全面、系统、简要和研究明代历史时之不可一日或缺有了更强烈的感觉,另一方面对其大量存在从文字到史实记载之失误或不妥,也有了进一步的察觉,已有的校勘记远未能包罗其文字失误,其尚无专书论列的史事记载之失误或不妥,同样比比皆是。例如史事的发生时间,有实际发生时间、报到朝廷时间、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办法时间、皇帝批示时间等之异,《明实录》中往往不予分别,笼统记于一天,造成时间模糊不清。又如《明实录》中的人物小传,或有摘自家传行状墓志者,与《明实录》上文的有关记载难免相互矛盾。再如《明实录》中对臣下奏疏的摘录,往往发生失误,与原意不合;其对

整个奏疏之概括介绍,如关于该疏内容涉及几事的介绍等,也时见不合实际者。另外,一事在不同年月日重复出现、同一人之名字在不同处所记互异等等,同样常常出现。《明实录》是一个与原始史料极接近而又含量最大,在研究明代历史时充当基本史料来源的史籍,对于它存在的上述不足之处,显然也是不应坐视不管的。

第二个感受是,应该利用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的大好时机,把整理明代史籍,特别是整理最重要的明代史籍的工作大力开展起来。信息时代为搜集史料作历史专题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为作明代历史专题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利用这一机会把明代历史专题研究推向新高潮是应该的。但是,与之同时,也应利用这一机会,把整理明代史籍的工作大力开展起来。这两项工作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把明代史籍整理得更准确、更可信,可为明代历史专题研究提供更可靠的史料,使其得出的结论建立在牢靠的基础之上,从而正确无误。反过来,明代历史专题研究之深入开展,可为明代史籍整理工作提供辨别正误的正确尺度,使之在眼花缭乱的纷纭记载面前,不为所迷,分清是非。当前学术界对历史专题研究和古籍整理两项工作有高低不同的看法,在流行的评价体系中更有明显的厚薄不同的倾向。这是不正确的,是社会浮躁情绪在学术上的反映。有眼光的学者应不受其干扰和左右。笔者呼吁明史工作者,能合理分工,将两项工作皆认真地开展起来。在当前的条件下,更强调适于进行明代史籍整理的学者,千万不可忘记投身于明代史籍整理的工作之中。这项工作开展得越早,就能越早地发挥其为明代历史专题研究提供可靠史料的历史作用。在刚刚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尽早认真深入地开展起明代史籍的整理工作,是时代赋予明史工作者的一项历史使命,同时也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个人掘得“第一桶金”的大好时机。笔者建议,在进行这项工作中,一方面要大力投入,另一方面要分清轻重缓急,根据价值大小轻重,有计划地依次进行。除《明史》校勘修订要继续进行,以求尽量完美之外,要首先进行《明实录》的整理,并尽早选取档案、文集、典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各类型各领域有代表性的明代史籍加以整理,把整理工作向纵深展开。

第三个感受是为了做好整理明代史籍工作,在重视利用网络手段搜集